

抗元活动与元代赣闽粤边界社会

黄志繁

(南昌大学 历史系 江西 南昌 330047)

摘要:文天祥等人在闽粤赣边界的抗元活动不仅是延续宋室命脉之举,而且也是给三省边界地区带来重大影响的“地方事件”。边界地区持续的社会动乱不仅使化外的“畬”人与化内的“汉”民等人群相互交融,而且官方的行政区划亦因此而跨越原来的数省边界,使边界模糊不清,导致赣闽粤三省边界形成元代一个独特的地区。

关键词:文天祥;抗元;赣闽粤边界;社会变动

中图分类号:K24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3)05-0108-05

Anti-Yuan Dynasty Struggle and the Social Disturbance of the Boundary Area of the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HUANG Zhi-fan

(History depart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7, China)

Abstract:The anti-Yuan Dynasty struggle led by Wen Tianxiang not only had the motivation to prolong the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d profound and lasting influence on the boundary area of the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because the anti-Yuan army was mainly made up of the strength of three provinces' boundary area. This area is turbulent throughout the Yuan Dynasty, meanwhile, "She People" (畬) and "Han People" (汉) blended each other. As a result,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the three provinces were often altered.

Key words: Anti-Yuan Dynasty struggle; social disturbance; boundary area of the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文天祥抗元事迹,已是人所尽知。笔者注意到,文天祥抗元活动基本以赣闽粤三省边界为范围,并且,在文天祥的影响下,有元一代此一地区抗元活动此起彼伏,频繁激烈。最近,学者多把赣闽粤边界的抗元活动和客家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认为畬汉人民的联合抗元活动促进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①但是,元代赣闽粤边界地区的抗元活动不仅对客家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亦是给赣闽粤边界社会带来深刻变化的“地方事件”。本文即在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把文天祥等人的抗元活动与元代三省边界社会变动联系起来考察,希望藉此了解元代赣闽粤三省边界区域社会变迁的内容和特点。

地方势力与文天祥抗元武装

宋末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元兵大举进攻南宋,德元年(即元至元十二年)(1275),元兵攻破鄂州,挥师渡江,南宋震动,诏诸路勤王。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捧诏涕泣”,起兵勤王。《宋史》卷四一八,《列传一七七·文天祥传》称:“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洞蛮,使方兴招吉州兵,诸豪杰响应,有众万人。”宋德二年(1276),临安陷落,同年,端宗在福建福安即位,闽粤赣也成了南宋王朝抗元的主要战场。

从上引《宋史·文天祥传》看来,文天祥勤王的部队主要由二方面人员构成:一是赣州、吉安两地的地方土豪;一是两地的“溪洞蛮”。文天祥动员了多少地方土豪,已不可得知。后来的天启《赣州府志》卷十二,《军功》说:“当时赣州大姓起

①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曹树基:《赣闽粤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和客家形成》,载《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23—135页;谢重光:《客家民系在畬汉联合抗元斗争中发展壮大》,《嘉应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收稿日期:2003-04-22

作者简介:黄志繁(1972-),男,江西石城人,南昌大学历史系讲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义旅相从者,如欧阳冠侯等凡三十三家,陈继周父子居幕中,卒死王事,尹玉以孤单力战与麾下五百人俱死,五木无一降者。”文天祥能号召赣南的土豪勤王和文天祥注意利用地方势力进行统治的思想不无关系。开庆元年(1259),文天祥在《己未上皇帝书》曾有如下建议:“四曰破资格以用人。……,至如诸州之义甲,各有土豪;诸峒之壮丁,各有隅长。彼其人望,为一州长雄。其间盖有豪武特达之才,可以备总统之任,一日举之,以为百校之长,则将帅由是其选也。……至如山岩之民,市井之靡,刑余之流,盗贼之属,其胆勇力绝足以先登,其智辩机警,足以间谍,……皆吾屈也。”^[1](卷3,《己未上皇帝书》)后来文天祥就任赣州知州,这一思想有可能得以实践。文天祥对友人说:“某治郡以来,书生迂阔之说,颇有效验。祖母六月生日,集城中内外老人,自七十一至九十六,为男女一千三百九十名,稿恤有差。老者既踊跃,而少者皆知以老为贵,礼逊兴行,词讼希省。”^[1](卷6,《与文侍郎及翁》)

除了文天祥自己的威望之外,当时闲居赣州城中的宁都土著陈继周,对勤王军队的组织发动也起了作用:“陈继周,……宁都人,以贡士有军功,历仕州县二十八年,家居赣郭中。诏勤王,丞相造门问计,继周具言间里豪杰子弟与凡起兵方略甚详。其子太学生逢父亦昼夜参预筹画调度。”^[1](卷19,《文丞相督府忠义传》)

虽不能肯定上引天启《赣州府志》所说的赣州大姓“三十三家”为实指,但在文天祥部队中,宁都土著大姓确有相当比例。文天祥同乡胡广记述说:“万石阴与吕师夔通,置司抚州,囑守臣赵必昂以宜黄令时秘状称:宁都连、谢、吴、唐、明、戴六家义士劫乐安、宜黄,将至抚州。申枢密院。天祥言:宁都六姓招募数千人驻吉州,侯旨入卫,未尝有一足至抚州境内。”^[1](卷19,《丞相传》)据《宋史》卷四五,《忠义》记载,除地方土豪外,“郡中豪杰”也包括一些地方官吏,如上文中的尹玉,原为“赣州三寨巡检,秩满城居,从文天祥勤王”,还有兴国知县何时等。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并结溪洞蛮”。笔者曾有文论述过,在宋代文献中,“溪洞”如果和“蛮”联系在一起,指的是“畬、瑶”等“不纳王粮”的化外之徒。^[2]对这股势力,文天祥一直注意加以利用,所谓“诸峒之壮丁”中的“隅长,……以为百校之长,则将帅由是其选也。”从时人指这支部队时用“溪洞蛮”“土豪蛮”等词汇可推测^[1](卷17,《纪年录》),在文天祥部队中“溪洞蛮”是有相当的比例的。“土豪”和“溪洞蛮”等地方力量,一直是文天祥进行抗元斗争的军队的主要来源。

德祐二年(1276),临安陷落后,南宋开始以福建和广东为根据地进行抗元斗争。文天祥从元营脱逃后,景炎元年

(1276)七月开赴福建南剑,十一月在汀州聚兵抗元。景炎三年(1278),文天祥被执于广东五坡岭。南宋最末两帝驻跸闽粤,赣闽粤三省边界因而成为文天祥抗元的主要战场。例如,景炎二年(1277)三月起文天祥一直在赣南活动,直至八月在兴国空坑兵败,始遁入汀州。此次起兵,文天祥同样特别注意利用地方势力进行抵抗。其好友邓光荐对此多有记录:“陈子敬,赣人,以资力雄乡里。行府至汀,子敬请招集义兵,置屯皂口,据赣下流,以遏北船,忠效甚著。行府败,聚兵黄塘,连结山寨,不降,北以重兵袭其寨,寨溃,不知所终”;“李梓发,字材甫,南安军南安县人。世为邑豪,主溪洞隅保,梓发为南安三县管界巡检。江西陷,南安守杨公畿迎降,独南安一县不下,邑人黄贤与梓发共推前南安尉永嘉叶茂为主,治守具”;“唐仁,南安土豪也。奉同督府命通江西音问,结约取赣,约日举火为号,城内外夹击。仁军轻,先期至,北军浸觉,闭营督捕格杀,仁军不见火,遽退,赣军歼焉。”^[1](卷19,《文丞相督府忠义传》)

必须注意的是,邓光荐写《督府忠义传》的目的,是为了表彰忠义,许多没有在文天祥直接领导下的地方武装首领,包括一些溪洞等蛮族力量也被收入,但这些地方抵抗力量大多接受文天祥的名号,听其号令。《宋史》卷四五四,《忠义》记载了许多类似的事例,例如,“萧明哲,太和人,天祥开府汀州,辟充督府榷架阁监军,师出岭,明哲以赣县民复万安,连接诸砦拒守”;“(胡文可、胡文静)丞相起兵勤王,遣萧架阁入野陂连接诸寨,文可罄家资招义勇从之,由南赣间关海上与参谋议”;“(江西招谕副使邹泐)……空坑败,窜身溪洞,约结酋杰,引兵入广”;“(文天祥妹婿彭震龙),……乃结峒獠起兵。天祥兵出岭,震龙接应,复永新县。”利用“溪洞蛮”力量的不仅是文天祥,当时另一位抗元大臣张世杰的部将中也有“畬族”首领。据《潮州志·丛谈·事部》记载:“许夫人,潮州畬妇也。景炎元年,宋帝趋潮州,张世杰招义军,夫人倡率诸峒畬妇应命。二年六月,世杰自将淮兵讨蒲寿庚,夫人率所部往会,兵势稍振。后帝泊浅湾,夫人复率兵海上援之,至百丈埔,遇元兵与战死焉,土人义而祀之。”^[3]《宋史》卷451,《忠义·张世杰传》亦载:“(景炎二年)四月从二王入福州,……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将陈吊眼许夫人诸翼兵攻蒲寿庚,不下。”文中的“陈吊眼”是活动于广东的另一畬族首领。本来畬瑶与编户齐民的界限就变动不居,峒寇畬瑶等人群中也经常混杂着“盐寇”和“遁逃之民”,文天祥就曾说过:“潮与漳、汀接壤,盐寇、峒民群聚剽窃,累政。”^[1](卷11,《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可见盐寇与畬民有混合的趋势。这些地方势力本来就是动乱之源,他们在文天祥等人抗元的旗帜号召下,互相融合混杂,使有元一代三省边界地区动乱不止,几无宁日。

社会动乱与“畬汉”合流

元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灭亡。但元军在南方各地仍继续遇到顽强抵抗,《元史纪事本末》卷一,《江南群盗之平》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天下始一统。其年,漳州陈桂龙即起兵,与建宁黄华势合。继以广州之林桂方,象山之尤宗祖,循州之钟明亮,广西之黄圣许等,……,连岁弄兵,终世祖之身,未获殄灭。”其中,赣闽粤三省边界的动乱无疑是十分突出的,从史料上看,至元年间在闽粤赣边界几乎每年都有盗贼叛乱。这些动乱,基本上都是“畬民”的叛乱,以福建、广东为中心,影响及至江西,诸如“诸郡盗贼蜂起,所在屯聚”等记载充斥史籍。^[4](卷9《故嘉议大夫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陈公墓碣》)下面的记载即是其时社会动乱状况的写照:

赣士胡廉言曰:廉家在石城,至元末广之剧寇驻赣境,当路不亟殄平,受其降而许其留。俘掠杀戮自若,群不逞相挺而起,环二三百里罹其凶害,惶惶奔窜。先父字际叔,己丑春,避寇病卒于途,先母徐氏卖簪珥以葬。廉甫九岁,弟绍甫六岁,二女兄幼德已适赖,幼端未行,寇势益张,……,舅家难久居,转依长女兄。寇息始复故里,满目蒿莱,死者过半,田无人耕,一二邻旧虽为编茅盖头,然稿无生意,莫可安栖。依近族,依远族,依内亲,依外亲,或半月,或一月,或二三月,靡有定止,如是又数年,乃还草庐中。习耕寥间,荒凉人所不堪,……又尝一族偕行,搬挈行李,先母督促甚急,众莫晓解,行速向前者,薄暮大(疑为达)邑。有二盐商行缓殿后,被寇追及,陨命,相去仅二里。^[5](卷69,《石城胡际叔妻徐氏墓表》)

石城乃闽赣边界的县,胡廉作为一个普通百姓,从出生起就历经动乱之苦,颠沛流离,表明元代初年元政府并没有很好地维持这一带的社会秩序。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文献中常出现畬兵至十万甚至几十万之众的记载,这固然是虚夸之辞,但确也说明畬兵反叛人数之众。例如,《元史》卷一二,《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建宁路管军总管黄华叛,“众几十万,号头陀军,伪称宋祥兴五年,……”;至元二十五年(1288),“畬寇钟明亮起临汀,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闽、广交病焉。”^[6](卷2《参政陇西公平寇碑》)元人描述钟明亮起事情形,说道:

初,明亮之首乱也,汀州草间匹夫尔,非有权位号召,世资凭藉,奋臂山泽,一呼数万众,斩刈剽寇,飘流震汹,蹂江闽数郡之地,动江、闽、浙三省之兵。……上烦庙堂应接,诸省奔赴,竭数载之力,仅得明亮至军前一面。而诈降无实,傲睨反复,气凌威铄,未尝获一交锋决胜,明亮竟堰然得保首领以歿。既歿,众犹畏服,止奉一木主尔,籍其虚声余烈,尚能统御所部,不即降溃。彼何道以臻此?此之谓盗亦有道者欤!……有脱身贼中者,

具言明亮有威风,多智略得操纵谲诈之术,是非田野农夫比。……于都、石城、瑞金、建宁诸邑,则兵寇兼至,祸尤惨烈。至于庚寅,四面蜂起,明亮、邱元之外,赣、吉有谢主簿、刘六十,乐安有卢大老,南丰有雷艾江之徒,乘时响应,俱烦省官亲提重兵随处逐捕。……大德戊戌岁四月上吉,聊述前事。^[6](卷13,《汀寇钟明亮事略》)

这段记载基本反映了当时畬贼动乱范围之广,影响之大。钟明亮乍叛乍服,令官方非常头痛。至元二十六年(1289)六月,江西行枢密院月的迷失“请以降贼钟明亮为循州知州,宋世贤为梅州判官,丘应祥等十八人为县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应祥并赴都。”但钟明亮并没有如元帝谕令赴都,《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记载,十月“广东贼钟明亮复反,以众万人寇梅州,江罗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诸贼二十余处皆举兵应之,声势张甚。诏月的迷失复与福建、江西省合兵讨之。”这次征讨,结果不明,但从以上《水云村泯稿》记载看来,元政府最终无法让钟明亮臣服,只能让其“保首领以歿”。

所谓的“畬寇”之所以容易“一呼数万众”,乃是因为这些“畬寇”包括的不仅仅是原来居住在山区的“峒寇畬瑶”,还包括了大量逃离于王朝体制之外的编户齐民,钟明亮起事后,就有大臣说:“时行省讨剧贼钟明亮无功,恚复条陈利害曰: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7]黄华为福建畬军首领,从性质上说,畬军乃是元朝的“乡兵”,《元史》卷九八,《志四十六·兵一》载:“其继得宋兵,号新附军。又有辽东之钚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畬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这些“畬军”与“民”关系密切,颇有点从“畬”到“民”的过渡意味,把“畬军”转化为民一直是元朝征服努力的目标。《元史》有如下记载:“二十二年八月,……戊辰,……令福建黄华畬军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7](卷13,《世祖纪一〇》)“招谕畬洞人,免其罪”;^[7](卷12,《世祖纪九》)“放福建畬军,收其军器,其部长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7](卷16,《世祖纪十三》)“以宋畬军将校授管民官,散之郡邑”;^[7](卷17,《世祖纪十四》)但同时,也有叛乱之民窜入畬峒的,“壬辰,陈桂龙据漳州反,唆都率兵讨之,桂龙亡入畬洞。”^[7](卷11,《世祖纪八》)亡入畬洞更多的是民,前引“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即是明证。这种“民”“畬”之间的流动以福建汀州等地最为典型。《元一统志》引《图志》云:“(汀州)西邻章贡,南接海湄,山深林密,岩谷阻幽,四境椎埋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畬民。时或弄兵相挺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扰,盖皆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渐染成习,比数十年,此风方炽,古岂

有是哉。^①

上文最值得注意的是“比数十年,此风方炽”,说明“畬民”的活动在元代相当地活跃。《永乐大典》卷七八九〇《风俗形势》,引《元一统志》说武平县情况谓:“南抵循梅,西连章贡,……,往往为江广界上逋逃者之所据,或曰长甲,或曰某寨,或曰畬峒,少不加意,则弱肉强食,相挺而起,税之田产,为所占据而不输官,……,土著之民,流聚之徒,益见盗横。”这种“民”“畬”之间的流动迁徙,使三省边界山谷集中了许多“化外之民”,形成令统治者头痛的“逋逃之渊藪”,一方面使“化内”与“化外”界限模糊,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官方限定的行政区划界限,导致在元代出现了比较特别的行政和军事区划。

地方行政区划界限不清

元代地方统治机构主要是行省,有军事征伐则设枢密院,在行省和行枢密院之下又有万户府、千户府和宣慰司之类。这些机构大多有军事功能,临时性比较强,或设或废,变动不一。《国朝文类》卷四十,《经世大典序类·官制》说:“夫外之郡县,其朝廷远者则镇之以行中书省,又远于省,若有边徼之事则置宣慰司以达之,盐铁之类又别置官。有军旅之事分布于外者则置万户府,有大征伐则置行枢密院,无则废。”行省与行枢密院在军事功能上有互相补充之功效,上引《国朝文类》四十,《经世大典序类·各行省》说:“有征伐之事则或置行省,与行枢密院迭为废置”。惟有明了元代地方统治机构的军事性质,才能比较好地理解其兴废设置。元代赣闽粤三省边界的长期动荡状况使元政府在这一地区的行政设置举废不定,行政区划界限不清,下面以江西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为例来说明。

元代江西行中书省治所大部分时间设在隆兴,但有时也根据需要移到闽粤赣边界地方,《元史》卷六二,《志十四·地理五》记载:“十四年设元帅府为江西道宣慰司,本路为总管府,立行中书省。十五年立江湖东道提刑按察司,移省于赣州,十六年复还龙(疑为隆)兴(即南昌)。”虽不清楚至元十五年移省赣州的具体原因,但笔者推测可能是为了军事活动的方便。至元十三年(1276)起,张世杰的抗元部队一直在闽、广活动。至元十四年(1277)文天祥兵败兴国空坑,十月遁入汀州,十一月入广东循州,此后一直在广东活动,直至在海丰五坡岭被捕。当时元军的主要战场已移到闽粤赣边界,移省赣州当有利于军事调遣。实际上,当边界有重大军事活动时,江西行省治所常常会相应转移,至元二十七年(1290),又“移江西行省于吉州,以便捕盗”。^[7](卷四十,《经世大典序

类·官制》)随着行省治所移往边界,江西行省的统辖范围也相应增大,至元十五年,行省移在赣州,“福建、江西、广东皆隶焉”。^[7](卷10,《本纪第1书》,《世祖七》)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行省并入福建行省,但十九年复立江西行省,管辖范围包括了广东和江西大部分地区。

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立行枢密院于江南三省,其各处行省见管军马悉以付焉”。^[7](卷98,《志四十六》,《兵一》),显然江西行枢密院负有镇压广东、福建、江西三省盗贼的职责。《元史》有如下记载:“(至元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广东穷边险远,江西、福建诸寇出没之窟,乞于江南诸省分军一万益臣。诏江西忽都帖木儿以军五千付之”。^[7](卷98,《志四十六》,《兵一》);“(至元二十五年)秋七月,……戊戌,……同知江西行枢密院事月的迷失上言:近以盗起广东,分江西、江淮、福建三省兵力万人令臣将之讨贼。臣愿万人内得蒙古军三百,并臣所籍降户万人,置万户府,以撒木合儿为达路花赤,佩虎符。诏许之”。^[7](卷15,《世祖纪一二》)。至元二十六年(1286),畬贼钟明亮复反,江西行枢密院月的迷失即会合江西、福建行省并力讨捕,“闰十月,……丙戌,……广东贼钟明亮复反,以众万人寇梅州,江罗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诸贼二十余处皆举兵应之,声势张甚。诏月的迷失复与福建、江西省合兵讨之,且谕月的迷失:钟明亮既降,朕令汝遣之缚阙,而汝玩常不发,致有是变,自今降贼,其即遣之”。^[7](卷15,《世祖纪一二》)和江西行省类似,为了镇压盗贼的方便,江西行枢密院治所也会在闽赣边界变动,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乙酉,立江淮、湖广、江西、四川等处行枢密院,诏谕中外,……江西治汀州……”,七月,“徙江西行枢密院治赣州”。^[7](卷16,《世祖纪一三》)

江西行枢密院是临时性机构,成宗元贞元年,“罢湖广、江西行枢密院,并入行省”。^[7](卷18,《成宗本纪一序言》)实际上,江西行省也一直负有应付广东、江西、福建三省的盗贼的职责。试看如下记载:“(至元)二十四年,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破豪猾,去奸吏,居民大悦。是时,赣、汀二州盗起,如德指挥诸将讨平之,其胁从者多所全宥”。^[7](卷165,《列传第五十二·管如德传》)“(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贼钟明亮寇赣州,掠宁都,据秀岭。诏发江淮行省及邻郡戍兵五千,迁江西省参政管如德为左丞,使将兵进讨。畬民丘大老集众千人寇长泰县”。^[7](卷15,《世祖纪一二》)或许正为了江西行省对福建管辖的方便,至元二十八年,罢福建行省,“改福建行省为宣慰司,隶江西行省”。^[7](卷16,《世祖纪一三》)

由于元代在闽粤赣地方统治机构有较强的军事性,而且为了对付边界频繁的盗贼活动,区划设置变动不居,从而出

① 转引自嘉靖《汀州府志》卷4《户口》。

现江西行省范围常常跨越原来的数省边界(在南宋为路界)的情况,使边界模糊不清,成为元代赣闽粤三省行政区划的重要特点。在这种边界模糊的现象背后,则是前面所分析的“民”与“畬”之间的流动。事实上,终元之世,仍有许多具蛮夷背景的“畬”民活动于广袤的闽粤赣湘边界,元末至正年间,有人形容南雄的情况说:“而远僻在万山间,与韶之翁源、赣之龙南、信丰相接,溪峒险恶,草木茂密,又与他郡不侔。故其人为獠,暴如虎狼,至如寻常百姓,渐摩熏染,亦复狼子野心,不可以仁义化也。”^[8](卷2《南雄府判琐达卿平寇序》)表明直到元末,由于官方控制不力,这一地区仍带有强烈的“化外色彩”,后来明代四省边界盗贼活动频繁,也与这一事实不无关系。

结 语

综上所述,文天祥等人在闽粤赣边界的抗元活动不仅是延续宋室命脉之举,而且也是对三省边界地区带来重大影响的“地方事件”。边界地区持续的社会动乱不仅使化外的“畬”人与化内的“汉”民等人群相互交融,而且官方的行政区划亦因此而跨越原来的数省边界,使边界模糊不清,导致赣

闽粤三省边界形成元代一个独特的地区。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明初天下大定,这一区域重新分属三省,但社会动乱等根本问题并未解决,明中叶起,这一地区盗贼蜂起,明王朝被迫在弘治年间设立统辖四省边界(包括湖南一部分)的南赣巡抚。

参考文献:

- [1] 文天祥. 文山先生全集[M]. 四部丛刊本.
- [2] 黄志繁. 宋代南方山区的峒寇: 以赣南为中心[J]. 南昌大学学报, 2002 (3).
- [3] 饶宗颐. 潮州志[M]. 民国三十八年本.
- [4] 赵孟頫. 松雪斋文集[M]. 四部丛刊本.
- [5] 吴澄. 吴文正集[M]. 四库全书本.
- [6] 刘埙. 水云村泯稿(卷2)[A]. 参政陇西公平寇碑[C]. 清道光十八年版本.
- [7] 宋濂. 元史[M]. 中华书局标点本.
- [8] 刘鹗. 惟实集[M]. 乾坤正气集本.

(责任编辑: 戴利朝)